

中国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系列

Series of Case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in China

赵冰 主编

黄石城市空间营造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in Huangshi City

黄凌江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系列

赵冰 主编

Series of Case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in China

封面 (110) 目录页设计

黄石城市空间营造研究

5.5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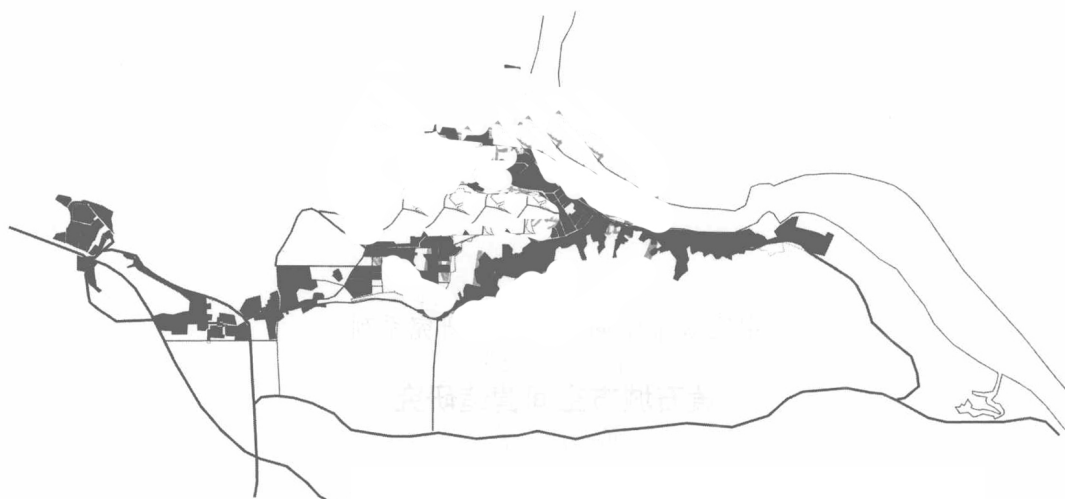
黄石城市空间营造研究

1. 11011-511-5-879 7112

黄石城市空间营造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in Huangshi City

黄凌江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石城市空间营造研究 / 黄凌江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2

(中国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系列 赵冰主编)

ISBN 978-7-112-14050-3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城市空间-空间规划-研究-黄石市
IV. ①TU984.2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4199号

责任编辑: 唐 旭 张 华

责任设计: 董建平

责任校对: 张 颖 陈晶晶

中国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系列

赵冰 主编

黄石城市空间营造研究

黄凌江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¹/₂ 字数: 264千字

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ISBN 978-7-112-14050-3

(2196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总 序

中国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系列是我主持并推动的一项研究。

首先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进行个案研究。城市规划对城市的研究目前多是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段笼统研究而未针对具体个案展开全面的解析深究。但目前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及城市规划的现实困境已促使我们必须走向深入的个案研究，若继续停留在笼统阶段，不针对具体的个案展开深入的解析，不对个案城市发展机制加以深究，将会使我们的城市规划流于一般的浮泛套路，从而脱离城市自身真切的发展实际，沦落为纸面上运行的规划，为规划建设管理带来严重的困扰。因此，我们急需做出根本性的调整，急需更进一步全面展开个案的研究，只有在个案的深入研究及对其内在独特的发展机制的把握的基础上，才可能在城市规划的具体个案实践中给出更加准确的判定。

当然也并不是说目前没有个别的城市规划个案研究，比如像北京等城市的研究还是有的。但毕竟如北京，是作为首都来进行研究的，其本身就非常独特，跟一般性的城市不同，并不具有个案研究的指标意义。况且这类研究大多未脱离城市史研究的范畴，而非从城市规划的核心思想来展开的空间营造的研究。

早在1980年代我就倡导以空间营造为核心理念来推动城市及城市规划的研究。在我看来，空间营造是城市规划的核心理念，也是城市规划基础性研究即城市研究的主线。

我是基于东西方营造与 Architecture 的结合提出空间营造理念的。东方传统注重营造，而西方传统注重 Architecture。营造显示时间序列，强调融入大化流行的意动生成。Architecture 则指称空间架构，强调体现宇宙秩序的组织体系。东方传统从意动生成出发，在营造过程中因势利导、因地制宜；面对不同的局势、不同的场域，充满着不断的选择以达成适宜的结果；在不同权利的诸多生活空间的合乎情态的博弈中随时进行不同可能序列的意向导引和选择，以期最终达成多方博弈的和合意境。西方传统的目标是形成体现宇宙秩序的空间组织体系；这一空间组织体系使不同权利的诸多生存空间的博弈能合乎理性地展开。而我提出空间营造就是将东西方两方面加以贯通，我认为空间营造根本

上是以自主协同、合和情理的空间博弈为目标的意动叠痕。

对于城市空间营造来说,何为最大的空间博弈?我认为应该是特定族群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生存空间意志和生存环境的互动博弈。当特定族群的人们有意愿去实现梦想中的城市空间时,他们会面对环境的力量来和他们互动博弈,这是城市空间营造中最大的一个互动博弈,人们要么放弃,要么坚持,放弃就要远走异地,坚持就要立足于这个特定的环境,不断去营造适宜的生存及生活空间。这是发生在自然层面的博弈。而在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为了各自的理想空间的实现也在一定的体制内进行着博弈,这其中离不开各种机构和组织的制衡。就个人层面,不同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意欲也会作为潜在冲动的力量影响其自主的选择。城市规划就是贯通这三个层次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给出的一次或多次城市空间营造的选择,其目的是以自主协同的方式促使空间博弈达成和合各方情理的一种平衡。

我提出的自主协同是至关重要的,在博弈中参与博弈的个体的权利都希望最大化,这是自主性的体现,但这需要博弈规则对此加以确保,博弈规则的确立就需要协同,协同是个体为确保自身权利最大化而自愿的一种行为。协同导致合和情理的博弈规则的遵从,这也是城市规划的目的。

和合各方情理就是促使博弈中诸多情态和诸多理念达成和合。这里也包含了我对城市规划的另一个看法:即城市规划应试图在空间博弈中达成阶段性的平衡。假如没有其他不期然的外力作用的话,它就达到并延续这种平衡。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不期然的外力,空间博弈就会出现不平衡。规划就需要再次梳理可能的新关系以达成空间博弈的更新的平衡。

多年来的研究与实践使我深感城市空间营造个案研究的迫切性,更感到城市规划变革的必要性。在我历年指导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中目前已陆续进行了30多个个案城市的空间营造的研究,这是我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我希望从我做起,推动这项工作。

所有的这些个案城市空间营造研究的对象统一界定并集中在城市本身的空间营造上。时段划分上,出于我对全球历史所做的深入思考,也为了便于今后的比较研究,统一按一维神话(中国战国以前)、二维宗教(中国宋代以前)、三维科学(中国清末以前)三个阶段作为近代以前的阶段划分,1859年以后近代开始,经1889年到1919年,1919年现代开始,经1949年,到1979年进入当代,经2009年,到未来2039年。这是近代、现代、当代的阶段划分,从过去指向未来。

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城市个案,就要研究它从开始诞生起,随着时间的展开,其空间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时空是如何转换的,其空间博弈中所出现的意动叠痕营造是如何展开的,最终我们要深入到其空间博弈的核心机制的探究上,最好能找出其发展的时空函数,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个案城市2009年以后空间的发展给出预测,从而为进一步的规划提供依据。

空间方面切入个案城市的分析主要是从城市空间曾经的意动出发对随之形态化的体、面、线、点的空间构建及其叠痕转换加以梳理。形态化的体指城市空间形态整体,

它是由面构成的；面指城市中的各种区域空间形态，面又是由线来分割形成的；线指城市交通道路、视线通廊、绿化带、山脉、江河等线状空间形态，线的转折是由点强化的；城市有一些标志物、广场，都属于点状形态，当我们说空间形态的体、面、线、点的时候，点是最基本的，点也是城市空间形态最集中的形态。这就是我们对于个案城市从空间角度切入所应做的工作。当然最根本的是要从空间形态的叠痕中，体会个案城市的风貌意蕴，感悟个案城市的精神气质。

时间方面切入个案城市的分析包含了从它的兴起，到兴盛，甚至说有些城市的终结，不过目前我们研究的城市尚未涉及已终结或曾终结的城市。总体来说，城市是呈加速度发展的。早期的城市，相对来讲，发展较为缓慢，在我们研究的个案城市中，可能最早的是在战国以前就已经出现，处于一维神话阶段，神话思维引导了城市营造，后世的都市守护神的意念产生于此一阶段。战国至五代十国是二维宗教阶段，目前大量的历史城市出现在这个阶段，宗教思维引导了此阶段城市营造，如佛教对城市意象的影响。从宋代一直到清末，是三维科学阶段，科学思维引导了此阶段城市营造，如园林对城市意境的影响。三个阶段的发展时段越来越短暂，第一阶段在战国以前是很漫长的一个阶段，从战国到五代十国，这又经历了将近一千五百年。从宋到清末，也经历了九百年的历程。

1859年以后更出现了加速的情况。中国近代列强入侵，口岸被迫开放，租界大量出现，洋务运动兴起。经1889年自强内敛到1919年六十年一个周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完成发展的一个循环。从1919年五四运动思想引进经1949年内聚，到1979年，我们又可以看到现代六十年发展的循环。1919年到1949年三十年，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从1979年改革开放兴起，经2009年转折到未来2039年又三十年，是当代六十年发展的循环。从发展层面上来说现当代一百二十年可以说是中华全球化的一百二十年。它本身的发展既有开放与内收交替的历史循环，也有一种层面的提高。我从1980年代以来不断在讲，1919年真正从文化层面上开启了中华全球化的进程，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唤起了中国现代人的全球化的意识，有了一种从新的全球角度来重新看待我们所处的东方的文化。通过东方和西方的比较来获得一种全新的文化观。1919年一直持续到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领导的时代的到来，中国进入到一个在文化基础上进行政治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持续到1979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以政治革命来主导中华全球化的进程。这个阶段是建立在上一个阶段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所开展的一个政治革命的阶段。这种政治革命是有相应文化依据的，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化意义上的全球视角，所以它就在这个视角上去推动一个全球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运动，希望无产阶级成为世界的主导阶级，成为全球革命的主体，以这个主体来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制度。这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一种政治革命。这种政治革命到1979年宣告结束。1979年以后，随着邓小平推动的以经济为主的变革，中华全球化就从政治革命进入到一个更深入的经济改革的时代。这个改革的时代一直持续到2009年，可以说中华全球化获得了更深入的发展。不仅仅在文化，在政治，也在经济这三个层面获得了中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当然2009年到随之而来的2039年，

中国将会更深入的在以前的三个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以公民社会的建构为主,公民社会的建构将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呼声。未来我们会以这个为主题去推进中华全球化,推进包括空间营造在内城市规划的发展。

实际上在空间营造方面我们也经历了与文化、政治、经济相应的过程。在特定的阶段都有特定的空间营造的特点。我希望在对个案城市的研究中,特别应该注意现当代空间的研究。结合文化、政治、经济的重点展开来具体的分析。比如1919年至1949年三十年中,当时的城市空间营造推进了一种源于西方的逻辑空间意识,这种逻辑空间意识当然是以东西方结合为前提的,与之呼应出现了一种复兴东方的传统风格的意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中,城市的风貌表现出的一种相互间的整合,总体上是文化意识层面的现代城市空间的营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南京的规划,就是以理性空间结构与传统的南京历史格局相结合。第二个阶段,1949年到1979年,由于政治是主导,所以在空间引导方面更多的是以人民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空间的营造。这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空间意识,比如说北京城市的空间营造,特别能够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空间的权力,人民的权力空间。所以包括天安门广场,以及整个围绕天安门广场的空间的布局,它反映出的一种现代中国人民的权力意识的高涨。面对着南北轴线上的紫禁城,如何去和它相对抗,出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竖立在南北轴线上,正面对着紫禁城的空间,表现出人民的一种强大的权力。毛泽东的纪念堂最终也在1978年落到了南北轴线上。更是最终定格了人民的权力。这是关于天安门广场的空间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一种象征性,北京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关于人民政治权力的表现,在空间上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当时的各个城市也同样建立了人民广场,同时工人新村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空间类型。单位的工作、生活前后空间组织的格局成为最基本的空间单元。1979年至2009年,这三十年在空间上更多的是关于空间利益的。不同的空间代表不同的利益取向。从开发区的划定,到房地产的楼盘泛滥,城市空间的营造离不开空间的利益,离不开不同的个体或集团通过各种手段在城市建设中获得自身最大化的利益。

从2009年以后未来三十年将会如何?这就涉及对未来发展的宏观认识以及未来城市规划应该把重点放在何处的的问题。它涉及未来我们以怎样的思想和方法来进行规划,涉及城市规划自身的变革问题,涉及规划师自身的转型问题。我提出用自主协同、和合情理的规划理念和方法来开展个案城市今后的规划,这当然是基于空间营造是以自主协同、和合情理的空间博弈为目标的意动叠痕思想而对个案城市的一种把握。我希望能够整合现当代所获得的空间之理、空间之力、空间之利来达成未来的空间之立,个体的空间自立是阶段性空间博弈平衡的目标。这里的核心是要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自主性,同时防止他们侵害到其他的自主性,使得我们的规划能够去适应一个新时代的公民社会的建构。

我们研究这些个案城市,就是为了顺着族群生存空间的梦想及其营造实现这一贯穿始终的主线,梳理个案城市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空间营造所面对的一次次来自自然、社会、个人的挑战及人们所作出的回应,把握它独特的互动机制,从而进一步推动它在未来的

空间营造特别是公民社会的空间建构中来具体实现自主协同、和合情理的空间博弈。这就是我希祈每一个案研究所要达成的目的。

在体例上，所有这些论文也都是以这样的基本格局来展开的。我希望我指导的硕士生、特别是博士生能够脚踏实地，像考古学家一样调研发掘他所研究的个案城市的营造叠痕，也要深入钻研，像历史学家一样详尽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并且发挥规划师研究和体悟空间的特长以直观且精准的图文方式展现我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图的绘制，这本身就是研究的深化。

最后，我表达一种希望，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研究计划中来，以便尽早完成中国 600 多个案城市的研究，同时推动城市规划的变革。

武汉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创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 冰

2009 年 7 月于武汉

分 序

西亚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族群纷争最激烈的地方，文明初期的大多数族群在激烈的纷争中已经随着文明的更迭在西亚本土消失了，这些消失的族群很多流落到西亚以外的区域，特别是向着日出的东方迁徙所经过的南亚、中亚和东亚或更远的美洲。在印度和中国及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还保留着早期源自西亚的族群，虽然他们的文化和历史记忆经历了数千年的不断在地化，但其核心未变。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族群迁徙的历史还原，辨析这些族群的源流。特别是当今分子人类学的技术在族群个体遗传方面更提供了坚实的佐证，尽管我认为目前分子人类学家们所勾画的族群迁徙的图景缺乏历史叠压意识而只是现状的投影因而不正确的。我的基本的判断是：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主体族群其实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西亚早期族群的特征，也延续了其文化的命脉，特别是以炎黄为先祖的中华民族更成为其文化主脉的传承者。这也是目前中华全球化中重建世界文明史的重要的判断。

对于现今流行的世界文明史的主干体系，我基本持扬弃的态度，那是西方中心论意志下的世界文明史。其表述体系基本上以西方为主线，价值指向了西方全球化，其特征在于对其所掌握的史料进行空间分布的梳理，但缺乏通过现存各个族群进入历史本身的全面贯通，连西方各族群自己都无法在其历史表述体系中看到自身的来龙去脉。这当然也和西方文化和文明特质有关，西方人擅长同一性结构的建立，其历史表述体系不会顺着族群自身的演化去追溯，这样的后果是压抑了现存各个族群自身的历史脉动，增加了未来各个族群相互间的内在冲突。这也是西方文化在当今全球化中的缺憾所在。随着中华全球化的规模和强度日趋加大，以中华的视角重构世界文明史迫在眉睫。中华的视角会在兼容西方族群历史视角的同时，以中华族群所擅长的进入历史之中的优势，去和世界现存各个族群一道来梳理他们自己的来龙去脉，及族群精神信仰的源流，以达成全面贯通世界历史、和合全球族群的目的，从而从历史的梳理最终走向建构未来和合的全球文明。

应该说西方族群的历史视角有其族群间在空间上以逻辑的力量相聚拢的很有价值的一面，当今全球化也确有必要切入这种视角，但单纯这一视角无论如何去完善都无法达成族群间的多元和合，而这却是中华族群的历史视角擅长并在未来可以做到的。当然中华族群现代以来一直在提升其历史研究的逻辑，以最终贯通包括西方在内的各个族群的历史。与此同时对于中华自身的历史也在进行重新的梳理，剥离数千年来持续不断的在地化的历史构造，结合考古学、分子人类学、语言学等最新成果，还原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等早期真实的世界文明史的脉络，并在全球层面和其他族群的历史进行对接贯通。

其实，族群迁徙的在地化在东亚表现得十分突出。西亚及相关地区的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的历史在东亚后代的传承记忆中几乎完全被在地化为东亚的历史了，但这种在地化始终存在着无法圆通的裂隙，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裂隙最终可以击破在地化的历史幻影。比如炎黄大战总是和黄帝蚩尤大战纠结在一起，始终无法圆通，这其中就有裂隙。其实击破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东亚在地化的历史幻影，我们会看到，殷商武丁以前的很多历史事件并不真实发生在东亚，中华一直以来早期历史的宏大叙事是以西亚为核心地区发生的具有世界性的文明史。三皇五帝及夏时的西亚连同北非是世界文明的大舞台，殷商时这一主导文明向南亚、中亚及东亚拓展，殷武丁以后才拓展到东亚的沿海地带，而周人将这一主导文明全面带入东亚，并如榕树一样在主干以外落地生根是周平王东迁以后的事了。早期文明史的主根和主干是在西亚及相关地区，其他皆如榕树的气根一样是拓展以后的落地生根。

在这种还原中，更早期东亚的族群及已失忆的历史的找寻就突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只能在少数民族的族群记忆中去找寻，而这也同样要面对少数民族族群在地化的历史幻影。好在这些族群尚在，考古遗迹也不断出现，通过蛛丝马迹我们还可以去追溯还原。万幸的是，我们在台湾和南海及太平洋岛屿甚至可以找到至今尚保留完整的很多早期族群。这得益于海洋的保护，使这些岛屿的族群在遗传和语言文化诸多方面得以像活化石一样留存至今，并在我们面前打开了通往更早期亚洲大陆迁徙历史的大门。

在我所主持的较为微观的城市空间营造的个案研究中，同样贯穿着从历史的梳理最终走向建构未来和合文明的追求，只是它所处理的个案更微观，其实也更能实现历史和未来的贯通，在个案城市的空间营造的历史中去营造城市的未来空间。这里最根本的是个案城市的族群的更迭及不同族群的叠痕营造，也就是我常说的“空间混搭”。

研究族群的更迭是个案城市空间营造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空间混搭的可能。族群迁徙是绕不过的话题，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从事规划设计的规划师和建筑师更能体会从历史到未来的一以贯之的转换，尽管他们的聚焦点是在族群的生存空间的形态化上。城市是族群迁徙驻足的地方，是族群定居的场所，族群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在地化也是由此落地生根。从研究角度剥落在地化的痕迹，还原族群来龙去脉，个案城市族群更迭的研究是重要的切入点，也是个案城市空间营造研究的基础。当然，个案城市中生活的每个人是族群文化和历史记忆在地化及未来空间营造的自主的主体，这

是须根本牢记的。还原族群历史真相并不能去除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在地化，恰恰它是站在更高层面兼容了曾经的在地化，并使城市源于族群的历史的内在冲动更加顺畅地呈现出来，也使城市的空间形态更有意蕴，并且在更大范围的城市博弈中使城市自己的个性彰显出来。

关于中国城市所涉及的族群是非常广泛的，这些族群会牵涉目前世界上现存的更广泛的族群。这里要先指出我对族群迁徙研究的基本立场：世界现存所有的文明从根本上说是同源异流的，正如现代人在全球独存而其他入种已消亡一样，异源的文明即使有，在全球文明史中也会找到更进一步的同源出处，因为现代人本身就是同源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界定，我们总能找到多元共有的一元出处，只需进一步的追溯。这也和文明的定义有关，多元共有的一元出处最后就是定义！独存的现代人的文明在同源异流中始终保持着相互的关联，从差异的种族到差异的民族，各个族群皆对文明有所贡献。实际上文明就是在族群相互关联激荡中发展壮大的，多元恰恰是同源异流的族群之间的互动，只是有些互动有着时空上的复杂交错。

目前生存于东亚的中华民族的主体自身就源于西亚，之后又不断有自西迁徙而来的族群的加入和层累影响，他们不论是沿着欧亚草原的青铜之路，还是北丝绸或南丝绸之路，甚至海上之路，总体上由西而东形成了文明东渐的大格局，这与从西亚进入欧洲及地中海的西渐的格局遥相呼应。自1万年前至7000年前之间由于全球气候暖化达到高潮，海平面因而升高15~50米，之后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大洪水，随后气候开始渐趋寒冷，至今虽有小的波动，但大趋势一直未变，这导致了处于北纬度较高的族群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而不断南下。这在中国及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就形成了由西而东和由北至南不断挤压的格局，直到太平洋深处，越向东南地区就越可以看到被挤压后的叠层和更早的族群。与此对照欧洲及地中海的西渐的格局也呈现出越向西越被挤压的情形。而欧亚草原则是东西方族群互动驰骋的辽阔舞台。

中国城市在这种族群迁徙的格局下，成为连接族群迁徙的主要节点，族群统辖范围的变化使城市有兴有衰，但能保持至今的，往往都是处于有助于这种大的格局中族群间不断的自主整合的地方。我们所研究的中国的城市不论其历史长短一定是这种大区域格局中的重要节点，它们皆在一定时期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族群生存的区域空间。从这些节点可以有一定路径保持区域空间内外的联系。当然这些区域空间往往是和特定流域和流域间所形成的地理单元相一致的，比如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等相关的各个地理单元及它们之间共同构成的不同层面的地理单元。江河提供了定居和迁徙的便利，流域也自然成为稳定的族群生存的空间。因而从族群的生存空间立场上，按流域切入个案城市空间营造的研究和叙述顺理成章。我们将按照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等分系列地出版个案城市空间营造的研究成果。

长江流域的族群的历史变迁更迭异常丰富，基本上不离由西而东、由北至南的挤压更迭的大格局，虽然局部也有战败族群西逃或兴盛族群北上作为的情形。诸多族群

也在长江流域的生存分延中获得了自己在地化的发展。在研究族群来龙去脉的过程中切记要击破文化和历史记忆在地化的历史幻象，还原其真实的迁徙历史。有时历史真相的推理在感觉上甚至很难接受，但还是要实事求是。比如稻作文明是长江流域在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文明，其发明者为哪个族群？考古证实应是上万年生活于此的族群，在我还原的早期东亚族群中他们是文明初期时的棕色及黑色人种，这在目前一般的认知上尚难以接受，但正视历史的真实是重建文明史的前提。

文明初期长江流域应是棕色及黑色人种活跃的地方，这些棕色及黑色人种的男性中C或D标记的基因在今天的长江流域的大多数族群中已荡然无存，说明他们很早就逃离了这里，或者大多已被灭绝，但是他们发明了稻作文明，成为今天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始祖。由于历史的久远，我们很难在中国大陆的族群中追溯还原这段历史，但是在台湾原住民塞夏族的汉名朱姓家族主持的黑人祭中却可找寻到蛛丝马迹。塞夏族其实就是人类最早的族群之一Seth塞特族的后裔，汉名朱姓实则姬姓，其先祖也是继棕色及黑色人种之后从丝绸之路和欧亚草原迁徙东亚的族群，它在东亚有很多其他的分支和族称，但经过还原皆可溯源到最早的塞特族。这是今日所有黄种人的先祖。其最早文明源起于阿拉伯半岛地区，后来曾有过苏美尔文明的辉煌，他们最早产生了玉皇即Jehovah耶和华的信仰。历史上的黄帝族群是其最辉煌的巴比伦时期留下的族群。塞夏族的黑人祭中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从小黑人那里学会了种植稻作，并一直感恩至今，当然祭歌歌词的解读早已在地化为台湾的空间环境，但在地化的历史幻象并不难击破。有些祭歌歌词的地名至今都无法和台湾的空间环境相契合，实际的场景应发生在今天的长江中下游流域。那时小黑人多生活在比今日海岸线和长江中下游的岸线更远或更高的山洞之中。塞特族的到来改变了东亚的族群构成和分布，他们接过了稻作文明并开创了东亚的城市文明。

后来四川和山东的蜀、河南的许、浙江的畬及云南的叟其实皆是塞特族的对音异名，他们和欧亚草原的塞人族群实际是同源异流的族群，但何时同源何时异流我会细细道来。

其实，在塞特族扩张之前曾有过Abel亚伯族，即濮族，这一族群最早也是源起于阿拉伯半岛地区，也曾活跃在两河流域，后来被该隐族击败，从此而向东发展，其支系也很早来到黄河和长江等流域。

今日白种人的先祖也是人类最早的族群之一，叫做Cain该隐族，姜姓，该隐族的文明源起于西亚北部，在西亚、中亚和南亚该隐族的后裔族群曾经建立过强大的雅利安文明，并在欧洲建立了西方文明，在近现代开启了全球文明。该隐族支系早期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也产生过重大影响，戈人和荆蛮作为该隐族炎帝子孙在东亚的真实历史几乎淹没在今日黄帝东亚支系文化主流的历史之中，而切断了和白种人的历史关联，其实戈人就是Guti哥特，荆蛮就是German日耳曼，而传说中的杜宇就是大月氏，就是Deutsch德意志。当然大量炎帝族群的记忆中的支系的后裔主要在欧洲，如赤狄即Celte凯尔特，戎即Roman罗马人。

该隐族、亚伯族和塞特族皆和亚当族有关，西亚的Adam亚当、Adam阿丹、印度的Dasa达萨、中国大陆的狄、氐、邰、滇、傣和台湾地区的泰亚族皆是对音异名，都

是一个原始族群的直系族群，其肤色偏棕色及黑色，基因混杂后亦呈浅色。在东亚小黑人就是其一支，它是历史最底层的族群，底字就源于此族群的称谓发音。

和这些族群相关的历史在东亚早已被在地化，最早在西亚发生的炎黄大战，和后来的塞特族直系后人闪族后裔周人和殷人的兄弟族群在中亚并延伸到东亚的战争混在了一起，被在地化为黄河流域发生的故事，其实只有战败殷人乘胜追击纣王直到海边的周人与殷人的这段历史才是真实发生在东亚的事件。当时非常惨烈的情形至今在被追杀的纣王及相关族群的后裔中被追述着。纣其实就是九黎族之君蚩尤，其后裔和归化族群苗族、瑶族和畲族被迫南迁，不仅遍布长江流域，也遍布长江流域以南包括东南亚等各个流域，以及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尼等南海、太平洋地区。中国台湾的西拉雅族和邵族其实就是浙江福建进一步迁徙的畲族，邹族主要是北邹应是纣王的直系后人。而在西亚的周人主体就是Jew犹太族群，在中亚的殷人主体就是Esau以扫或叫Edom以东族群。

在殷人族群到达东亚以前，同是Shem闪族后裔的越人东亚支系活跃在东亚各流域，越人的王族于越就是禹族少康子杼东征中亚南亚后东迁东亚的直系后人，禹族乃伊朗西南部的神州之族Elam埃兰。殷武丁以后炎帝族群后裔戈人在东亚作为先锋，压迫越人南迁，越人到达长江中下游流域后，进一步向南迁徙。此前越人曾挤压更早期在东亚的濮族支系和塞特族支系使之更向南方发展，甚至走入海洋，寻找适合生存的岛屿。濮族支系的卑南族和布依族此时登陆台湾，此前同是濮族支系的彭祖后人阿美族先期逃到中国台湾，南迁的塞特族支系塞夏族、鲁凯族和亚当族支系泰雅族应是更早时期受挤压而登陆中国台湾的。

总之我们看到，早期在长江流域的族群由于东亚大的族群挤压的格局，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族群分布，同时期的族群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相互间也处在博弈状态，自然会有此消彼长的空间领域的变化，也由于长江流域不同的地理单元形成了族群不断叠压或换位的状况。

在族群历史变迁更迭中，长江主干及支流几乎是早期族群大尺度迁徙的首要通道，特别是顺流而下的进攻或逃离，比如楚灭巴以后巴主要的一支巴旦也叫板楯或氐就是顺江而下后在东南沿海一带直至中国台湾、菲律宾等地发展，东南沿海的登人、中国台湾排湾族、达悟族、菲律宾巴旦族都是当时族群散落后的后裔，他们都崇拜蛇龙。秦灭楚以后罗人也是顺江而下入海直至朝鲜半岛，建立了新罗，至今还是朝鲜半岛的主体族群。不过回溯这些历史却还是要击破这些族群散落后的后裔在地化的历史幻影，韩国尤其需要这种自觉，我们自己就更不用说了。

具体就地理单元来说，沿藏彝走廊进入云贵高原，在长江上游流域存在着非常丰富的族群更迭，历史上进入东亚的族群在这里几乎都可以找到走过的痕迹，但留下的记载少，还原难度大，通过考古也许能大体追溯其历史原貌，滇人、昆人、僰人、蜀或叟人等族群的分布状况还有待廓清。其早期聚落或城邑规模不大，但丰富的族群及其冲突和融合，使其营造空间理念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也使高原上的城邑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后来滇池流域的昆明应是汉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它也同样表现出了族群文化多元性及城

市空间形态的斑块面貌。

以岷江流域为主的成都平原，其族群主要沿岷江迁徙而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揭示的面貌证实了其不同种族的族群的更迭及其和西亚、中亚的关系。蜀王祖先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前后相继的传说实际是迁徙族群的历史记忆，在此地真实发生的历史还需仔细分别。其实蚕丛就是羌族、杜宇就是大月氏 Deutsch、开明就是荆蛮 German。营造城邑的理念亦同样反映了和西亚、中亚的关联，截止目前成都平原已发现距今 4500 年前左右宝墩遗址、芒城遗址、郫县遗址、鱼凫村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和盐店遗址 7 座古城遗址，这一古城群是目前为止所知晓的中国早期规模最大的古城群。而成都从 3000 多年前的金沙遗址算起，其城址始终未变，城名未改，已成为现今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特大城市。

嘉陵江流域及长江三峡南北武陵山和大巴山地区是非常重要的地理单元，是以巴人为主的地域。原在长江中游的廪君蛮和板盾蛮受到楚的打击后退居此地，是今天土家族的先族，城邑依托山地，注重防御性。

长江流域中游的荆州地区是中国早期的南北通道上的重要地区，濮人、越人、巴人、瑶人、苗人、楚人、吴人、汉人等族群在这里留下了驻足的叠痕。也是目前东亚最早出现城邑的地区，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城市遗址距今 6000 年，是亚洲最早的城市，天门石家河城市遗址距今 4000 多年，有 120 万平方米，堪称同时期亚洲第一大城市，当是风姓伏羲族群的城市。荆州纪南城是当时长江畔最气度不凡的大都会，也是楚人强大的体现，楚作为荆蛮 German 日耳曼族群一支，充满活力，其在欧洲的同族 Jute 朱特也一样有活力。

汉江流域的汉水曾经被认为是今日长江的主干，汉之名称出于刘汉。由于汉朝 400 余年稳定的王朝统治，使汉人从统治者的称呼变成了东亚多民族形成的一个民族，实际上在此前汉就是“Han”含，古埃及人就被西亚人称为含“Han”，汉和“Khan”汗同源，刘氏家族就是“Iyelle”。不过汉水原本称襄水，应是向姓巴人生活的区域，在汉水各支系流域还生活着庸人、麇人、罗人、邓人、楚人等。襄樊和南阳处于汉水经过的南阳盆地，其城市虽经族群多次更迭，但因其处于南北交通要道，城市得以延续发展。

湘江流域是楚人南下扩张的主要流域，此前这里有夷人和巴人，湘江之名是向姓巴人从今汉水原襄水带去的，而长沙完全是楚人建立起来用于控制南方的中心城市，后来成为洞庭湖以南流域的中心城市和湖南省会。

长江流域中游云梦泽东部和云梦泽西部荆州地区遥相呼应的是武汉，武汉后来居上，成为长江流域中游流域的大都会，得益于区域性的重心东移。在云梦泽东部历史上的族群有鄂人、苗人、楚人和吴人等，鄂人经南阳沿随枣走廊来到鄂州，应是云梦泽东部早期的主要族群，吴人也曾以鄂州城作为都城。自大冶至铜陵地带，富含铜矿资源，对其开采自古至现代未断，现代发展起来的黄石等城市也因此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城市。

赣江流域是一个袋状的地理单元，大洋洲遗址显示了 3000 多年前这里曾存在的青铜文明，吴城文化就是九黎共同体及盟邦族群中的姜族群和有虞氏后裔徐方、群舒族群

及虎方族群先后跨过长江扩张形成的文化。后来的吴人、越人、楚人在赣江流域都留下自己城邑的痕迹，再后来的闽人、客家人也是自北而来经此扩散到闽粤的，并进一步扩散到台湾的。

长江下游流域水系发达，最早应是濮族支系和塞特族支系生活的地区，巢湖流域凌家滩遗址或许就是 5500 年前他们的中心城市。长江下游流域后来有越人和吴人等族群的分布叠压，考古揭示其早期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内外的水系交通密切相关。两千多年来，这里逐渐由中国边缘地带变成了最发达的地区，南京、镇江、扬州、无锡、苏州城市群已把江南的美称从中游转到了下游，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这里成为中西交融的前沿地区，也出现了上海这样的世界级的大都会。

总之，长江流域的族群历史变迁、更迭及相应的城市空间的营造显示了东亚族群发展最强劲的活力。我已主持研究了这一流域的大多数城市的空间营造，我希望个案研究系列之长江流域城市空间营造分系列的出版能推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项事业中来。

武汉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创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 冰

2009 年 7 月于武汉

前 言

城市空间的形成是在社会、经济、政治、人的意志及自然地理条件等多种力量合力作用下而形成的一种人类在大地上的空间痕迹。这种空间痕迹从宏观角度考察可以看作城市的形成、生长、破坏、扩张等不同阶段,是人类空间与自然空间的一种转换甚至是对抗。从微观角度考察可以看作城市中因为人的活动,包括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营造的一种空间形态,包括广场、街区、街道、建筑、室外环境等。从这个角度,城市空间是一种人根据自己的意志意愿自上而下进行营造的空间,空间的形态分布生长都出自于人的主观能动,但是从宏观角度而言城市空间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组织和他组织相结合的生成方式,其中受到人的意志的影响,也分为代表不同阶级的人或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互相交织,共同作用使得城市空间与人类理想空间产生着一种博弈,而要理解城市空间的营造则需要充分分析各个因素对城市的影响。

一个城市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在形成过程中,历史的印迹会自觉地体现并印刻在城市的空间中,通过城市的布局,功能要素的营造以及建筑单体的形态等各种载体予以反映。历史的进程对每一座城市都起到了影响,但是每座城市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拥有的发展条件不同,在发展中获得的机遇条件也各不相同,各种作用力的大小方向也不相同,因此城市必然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

黄石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其发展轨迹是一个与资源开采开发相伴的由逐渐兴盛,再由兴到衰的波动过程。从二三十万年前黄石地域开始出现人类活动,到先秦时期出现城,到明清时期发展成为繁华的市镇,由于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促使黄石在近代具备了形成城市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城市。在之后的30年期间,由于历史的需要黄石处于城市发展上升期;在1979年之后,由于历史发展的转移,黄石开始步入其衰落期;到2009年,经过一个甲子60年的发展,黄石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从资源依托的意义上这标志着一个城市发展周期的终结。通过研究黄石在不同阶段的城市空间的形成与营造规律,分析其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并分析影响因素的主次关系,进而对未来黄石

下一个周期城市发展做出合理的预测是本书研究的主体。

在空间区域纬度上黄石是长江流域中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城市。其产生、形成和发展都受到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处于长江流域矿产资源分布带是黄石城市发展的关键点,也是决定其之后成为资源型城市以及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根本;在时间维度上,城市的发展不能脱离时代的背景。黄石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关,因此在时间轴上,以30年为单位将黄石分为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这个时间坐标轴是以中国历史发展的节点划分的,并根据时代具体情况再加以细分。具体的划分为从1859年近代工业以及开埠的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49~1979年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30年期间,并根据当时中国的发展背景具体细分为“一五”计划期、大跃进和三年调整期以及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期;1979~2009年改革后发展重点由内地转向沿海以及资源逐渐衰退期,这一阶段黄石的城市发展规模已经有一定的积累,同时城市变化及扩张程度和速度加快,因此这一阶段又细分为每10年一个单位进行分析;2009年之后是黄石城市性质转变的一个节点。在人的空间理想维度上,黄石的发展始终受到人的控制,其主要方式是城市规划。从1946年开始总共进行了近10次对城市发展起到影响的规划,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人的空间理想作用在城市空间上。

从空间区域,时间和人的空间理想的维度去理解城市空间形成和营造的过程,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出发点。以城市空间历史叠痕作为切入点,对从古代城池的出现,东汉至明清时期市镇的出现,到2009年城市转型的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轨迹进行了较完整的历时性研究,着力总结黄石城市形态演变的空间、功能、结构等特征,深入探求空间时间和人空间理想等合力共同作用下城市空间形态演变,总结各个历史时期黄石城市形态演变的规律以及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本书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 研究黄石城市历史起源、演变、发展过程及其在各个时期政治经济背景下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包括古代黄石地域人类活动以及城市出现的背景分析;宋至清代沿江市镇作为黄石城市雏形的出现和发展;1859~1919年近代工业化初期城市空间营造;1919~1949年战争洗礼及战后城市空间的破坏与发展;1949~1979年工业化发展时期城市营造;1979~2009年经济发展时期城市空间营造等,总结各阶段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和空间营造特点。

2. 分析黄石城市的形成基础及形态演变的动力机制,包括黄石城市发展和空间营造的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自然资源禀赋、运输条件、工业化发展、商业的促进以及后资源时期城市发展理想等方面。

3. 分析黄石城市空间营造及演化的规律,资源枯竭的现实以及城市转型期的外界机遇,对黄石未来城市空间发展的不同方向进行比较,并提出未来城市空间发展及城市空间结构的预测。

本书是根据博士论文《黄石城市空间营造研究》进行扩充与修改完成,博士论文的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基于导师赵冰教授提出的“城市空间营造理论体系”,在写作过程